



DILIHUANJING YU SHIJIE LISHI

地理环境与 世界历史

杨利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ILI HUANJING YU SHIJIE LISHI

地理环境与 世界历史

杨利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杨利川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04 - 8826 - 2

I. ①地… II. ①杨…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009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责任印制 戴 宽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93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从远古的时代起，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就总是希望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又向哪里去？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的现在，还要了解自己的过去和将来。在印度和中国，人们把这种想得到但又得不到的能力赋予了神，虚构了时间上的三世佛：主管过去的燃灯佛，主管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主管未来的弥勒佛。

不仅在时间上的想象，还有空间上的环顾。我们的天下有多大？我们的外面还有谁？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要比较不同的方位有什么不同。从而，人们又虚构了空间上的三世佛：主持东方琉璃光世界的药师王佛，主持中央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主持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人们幻想“洞察三世”，目的是为了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握自己的命运。

令人产生奇妙联想的是，那坐在时间与空间横纵交叉点上的释迦牟尼，是怎样看待这古往今来的大千世界呢？

科学技术的发展揭开了人类近代史的篇章，人们也逐渐地从神那里收回了历史的主动权。十九世纪的中叶，两个重大发现使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探索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者可称得上是一次壮丽的日出，因为它从根本上变革了认识世界的方法。一百多年来，它一直成为我们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界的思想宝库。今天，科学的发展迅猛异常，历史学、社会学、未来学取代了三世佛，成为人类探索自己的

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世界各个区域的具体手段。人类，至少是人类中的先进部分，正在满怀信心地创造历史。

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困惑。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而在我们身后，也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但我们越是希望看得远些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就越是需要回过头去看。是的，我们脚下的时代车轮太快太快，有时竟来不及细细思索，而我们身后的历史又太长太长，把它看得很清已是如此不易。然而，我们总要回顾，从历史之镜的回光中吸取经验。

一句话，我们总要背负传统，脚踏实地，面向未来！

目 录

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石小敏	1
过时的是时间	吴稼祥	3
这是走向世界的脚步	张维迎	5
那年的犀利哥	冯 仑	7
自序		9
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		15
第一章 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 / 15		
第二章 哲学迷宫的漫游 / 27		
第三章 地理环境的要素和特性 / 59		
第四章 东方与西方 / 75		
第五章 世界历史的多线式发展 / 103		
第六章 历史的螺旋 / 133		

我的社会关注和哲学课题

——致友人书信 159

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上全面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 170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学习《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 179

氏族社会的管理制度与社会职能的独立化 182

震兆云霞

——对观念变革的沉思 206

现代化,你需要一个年轻的头脑 218

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利川素来认真。我和他同是一九七七级北大的学生，虽然不在一个系，但是八十年代思想活跃的校园生活，使我们有幸相识作了朋友。后来，在《未定稿》上读到他的文章《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当时引起许多共鸣。时光荏苒，一来往便是三十年。

工业文明发轫以前，人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作为首要的制约因素，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着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的差异与特点。其中地中海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某些明显的差异，曾引起许多先哲持久的关注与思考。

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中国可能是发展最为充分的典型。三面环绕的自然屏障所隔离出一方足够腾挪的地理空间、大陆季风式气候、大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北方游牧民族的频繁侵扰等等，使古代中国产生了非统一不易满足的四大公共诉求，这就是：（1）治水（以抗洪为主）；（2）戍边（修长城）；（3）常平（丰歉余调）；（4）教化（三纲五常，使民相安）。这四大公共诉求说到底，来自于维护和稳定农业生产、农耕社会的客观需要。四大公共诉求交织叠加在一起，其分量之重，远远超过了古代东方其他农业民族的社会共同体。

自秦统一、汉承秦制后，中国的治理方式逐渐定型了，这就是皇权专制、郡县制、科举选官，底层乡绅自治等一整套治理结构。皇帝作为天子，垄断了与上天（神）对话的权利，宗教反被抑入世

俗一流，加上以儒学为代表的王霸杂糅的官方意识形态、以伦理纲常、玄学为代表的士大夫哲学偏好，以方块字为代表的汉文字语言体系等，这一切，与皇权专制的治理结构高度熔结一体，形成了世界古代历史中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还强烈地反映在其从古代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如果比较近代以来的许多国家，我们发现，中国的转型来得异常的曲折和反复、漫长而痛苦。改革开放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义无反顾地将一个半农业半工业、在传统与封闭中挣绷自残的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之中，使之深深地融入全球体系了。如今，中国的大半个身子已经进入全球体系了，仅剩一条后腿还陷在传统中，一时还拔不出来。当地理环境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全球分工体系发生作用时，每一个国家的传统特色也就不再那么炫目而独放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尊重普世价值与遵守并不断完善全球共同的游戏规则，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正在以一个负责任的重大利益攸关者的姿态步入全球事务。“环球同此凉热”——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三十年前，中国刚刚启程改革开放，利川与我，还有许多朋友，都曾一起激情燃烧，一起忘我投入，每一个冲决传统僵化信条的新理论，都令人兴奋不已。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但那个时代毕竟已经远去了，我们都已届退休。如果能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该有多好。我们其实依然眷恋着年轻。朝花夕拾者善也，唯愿化作红泥，孕育并指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0年4月21日

过时的是时间

吴稼祥 著名学者

“亚细亚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多线发展”……这些词组，以及由它们连缀起来的句子，现在看上去，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片片草地，即使没有被人遗忘，也很少有人踏及。

不过，即便你在思想的旧城区里闲逛，偶尔踏到了它们，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但在杨利川写这本书里的论文时，可不敢这么说，这些词构成的区域，那时如果不是雷区，至少也是浪区，惊涛骇浪，没有点冲浪技巧，是要葬身鱼腹的。

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是作者的学士论文《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虽然几经修改，主题思想应该成形于1981—1982年，77级大学生毕业前的一两年。那个时代的主脉搏，是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生活，另一方面来自思想。安徽小岗村搞单干，是生活逼出来的；决策层在全国推广单干，则是思想解放推出来的。

感受到那个时代脉搏的思想者，总是要把论证变革作为自己的使命，杨利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思想路径是要对单线的社会发展图式提出质疑，这个理论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动车组，列车是从原始状态驶来的社会，轨道不可变更，车站一共五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如果社会事实上，或逻辑上

只能这样发展，中国的社会变革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意味着出轨或翻车。

杨利川要做的，就是告诉人们，人类历史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他寻找到的论据，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产力构成理论，把地理环境作为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并强调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二是早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把东方社会从单一发展图式中解救出来，认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方是垂直型社会，西方是横向型社会。他的结论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要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按同一个单一社会演进图式发展，就等于要拖拉机和火车在同一条铁轨上运行。

历史不是线性的，尤其不是单线的，这是杨利川最想说的。在他看来，历史发展，从多点，到多线，再到多面。不过，需要点明的是，虽然杨利川提到了历史发展的多线性和多面性，但他还坚持人类有一个相同的终点站，那就是“高级公有制”社会，马克思就在那个站台上等他。与马克思殊途同归，是他当时的冲浪技巧；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并且主动开放，融入世界历史，是他当时的冲浪勇气。

从以上的简述不难得知，杨利川三十年前表现出来的思想高度和理论胆识，即使今天看来，也难能可贵。他的论证可能称不上一种新的理论，但他关于地理环境的“量的优越”和“质的差异”的论点，关于“垂直型社会”和“横向型社会”的论点，以及关于历史发展的“点”、“线”、“面”三阶段的论点，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他在本书中提出的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具有何种影响这一论题，永远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时间。

2010年4月14日

这是走向世界的脚步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我第一次见到利川是在 1984 年春天，当时温元凯等人在合肥组织召开中国改革会议，我和利川住在同一个房间。那时候，我还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工作。尽管专业背景不同，但都是热血青年，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改革的前途，谈得很投机。他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时的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给我印象很深。我给他讲自己有关企业家的观点，讲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讲价值观念变革的重要性，他也非常认同。结识利川，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大收获。之后我们就成为学术知己，好朋友。

我到北京工作后，我们有一个十来人的学术沙龙，不定期地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利川是这个沙龙的灵魂人物之一。他不仅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富有激情，而且思想深刻，视野广阔。他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对东西方社会形态的影响的观点，对我这个学经济学出身的人来说，确实是耳目一新，很有启蒙作用。

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机缘的产物。上世纪 80 年代是启蒙的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学术界思想活跃，各种不同的观点不断涌现，离经叛道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利川是这场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鼓动者。他无愧于那个时代。他独立思考，严谨求证，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受到学界同仁的好评。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他写的这些文字，可以展示一代人

的思想轨迹，从而听到社会进步的脚步声。

凭他的天赋和训练，加上他的勤奋，利川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但他很早就将自己的“专业方向”确定为“为社会主义民主革新尽力”，至于用什么方式，学术的，还是政治的，他愿听从命运的安排。这或许是他 1985 年开始从政，到河南辉县出任县委副书记的原因。后来他“下海”做生意，可能仍是一种“务实”的路线吧。

但即使“下海”后，他也没有停止理论思考。每次与他相聚，我们讨论的仍然是理论色彩很浓的问题，他的观点仍然是学者型的。前几年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在网络上受到批评，他还写来电子邮件表示对我的支持，很让我感动。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发展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但利川当年写的这些文章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思，他提出的问题仍然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当然，研究这些问题是要花点工夫的。或许，这本文集的出版能诱发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利川二十九年前提出这样的论点：只有东西方的合流，才能实现“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只有融入“世界历史”，才能走出停滞。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实际证明，他的这个论点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个时髦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这一观点仍然值得我们牢记。

2010 年 4 月 20 日

那年的犀利哥

冯 仑 万通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

最近在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活动中经常见到利川，四目相对，常常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像是兄长、师生之谊，又像是经历人生起伏后淡然和惺惺相惜的一种情怀。利川让我对他即将出版的文集谈点感想，便一口答应，仿佛终于可以对他讲几句体己话，挺开心。

那时候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恰好研究生毕业，北京的热血青年和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极力主张和推动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相关的新观念。当然，这些观念绝大部分在今天看来已是习以为常，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言论、行为和认同的价值观，但当年还是有争议和备受关注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加入了利川他们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群体。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加油站。在这个群体中，有今天仍然活跃的张维迎、石小敏，也有现在已经在海外的一些朋友，还包括在国内八卦新闻中也出现过的作家亚丁，以及经历曲折的吴稼祥。这些好朋友在我刚刚硕士毕业、思考人生方向过程中，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和指点，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阳光、最进取、最有希望、最有干劲的一个时期。

那时候，有很多观念变革和体制改革的讨论会，大家热烈地讨论历史发展的逻辑，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可能。利川在那个时期也非常活跃，特别关注青少年的变化，以及体制改革中的历史哲学课

题。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学者，乃至在今天的交往中，仍然能感觉到他在北大哲学系所接受的系统教育带来的智慧光芒。

前一阵子在网上出现了一个“犀利哥”，由于生活和命运的玩弄，最后流落街头，在乞讨中却表现出奋斗、不甘倒下的硬汉形象，受到网友热捧。然而在被媒体不断的关注甚至过分关爱后他被告知，他的妻子和父亲为了寻找他出车祸死亡，最后他被洗干净，剃上头，带上浙江人才有的那种帽子送回江西。这个结尾有几分辛酸、几分滑稽，又有几分悲悯。他流浪的生活被发现、被关注以及又回归的故事不由让我想到这么多年命运和“犀利哥”有几分相似的利川。

同样是被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以利川早期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教育环境，如果放在一个有法制、有工作、家庭关照的环境中，那么这个犀利哥今天也许是我们社会的偶像，也许就是周杰伦第二，也决不输给小虎队，但遗憾的是他由青春朝气的生命开始，回归于无奈和悲悯。当年的利川也是一个硬汉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无异于今天的犀利哥。经过这二十多年生活的风霜磨炼，他今天的宽容、谅解和谦恭，让我感到他内心还有一个顽强热烈的追求，还希望更多地参与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当中。他今天拿出的这本书《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也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哦，那年的犀利哥！

2010年4月24日

自序

历史因时间的积淀而有价值，如果它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融在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我就曾有狂热的六十年代，迷茫的七十年代，思考的八十年代，下海的九十年代，“超体制”的千禧年代……

历史的美妙在于其创建时的不确定性。经过时间的考验后，才清晰地看到人的理念、良知、智慧、得失……惟其如此，回忆才是有趣的，发人深省的。

回首当年，我们会为实践证明的错误而反思，为已经暴露的虚伪而羞耻，为一时的软弱而汗颜，也为真诚的积极追寻和正确选择而欣慰。

重新翻看过去的记录，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校正向前的足迹。我的这本文集，也可以展示一代人的思想轨迹，从而听到社会进步的脚步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痛定思痛、催人思考、思想启蒙的时代。它在其后中国数十年发展历程中的作用，至今不可低估。当然，正如二十年代的救亡运动中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也中断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门渐渐打开。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我不由得问：政治动乱由何而起？思想专制根源何在？中国为什么有那样的过去，又会有怎样的未来？我们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又将如何融入世界？

在怀疑与思考中，我对“东方社会”的过去和未来产生了浓厚兴趣。

由于这些思考，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的题目，初稿有四万字。毕业后不久，我将整理后的文稿投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但由于学界争论的原因，取消了发稿计划，改发在1982年12月《未定稿》第40期。

之后，我又经过进一步研究，大约在1983—1985年写成本书所呈现的文稿。1985年底，我去了辉县县委任职，以后又进入企业界，文稿随之搁置，看起来，“学者”生涯似乎结束了。

在撰写《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的前后，我同时也对相关课题作了一些研究，诸如东方国家体制的形成、民主制度的历史渊源、信息时代中我们的选择、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变革等等。这些论文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压在抽屉里，也选出几篇收入本书中。

关于研究这些课题的初衷和历史背景，在《致友人书信》中已多次表露。我想说的是，我做这些研究并不仅仅（甚至主要的不是）出于学术的兴趣，而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生的思考，对开放与改革的向往。

萌发编书的想法，首先不是为了纪念，而是觉得这些当年的课题还不断被人问起，有待进一步回答。甚至，经过几十年后，特别是经历了改革的发展和困境，就更觉得当年的研究是如此必要。

这次选编，除了个别技术性的修订外，基本保持了原貌，不论是发表过的，还是手稿。当年的论点和论据，错误和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说，真实才有意义。

本书中涉及的课题和立论主要有：

——以往教科书中的“社会发展史”五段论不能解释东西方社会的差别，“亚细亚生产方式”才是古代东方社会的主要特征；

——自然界通过人类劳动实践进入历史，成为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农业社会（土地所有制）时期担当着主要生产资料的角色，